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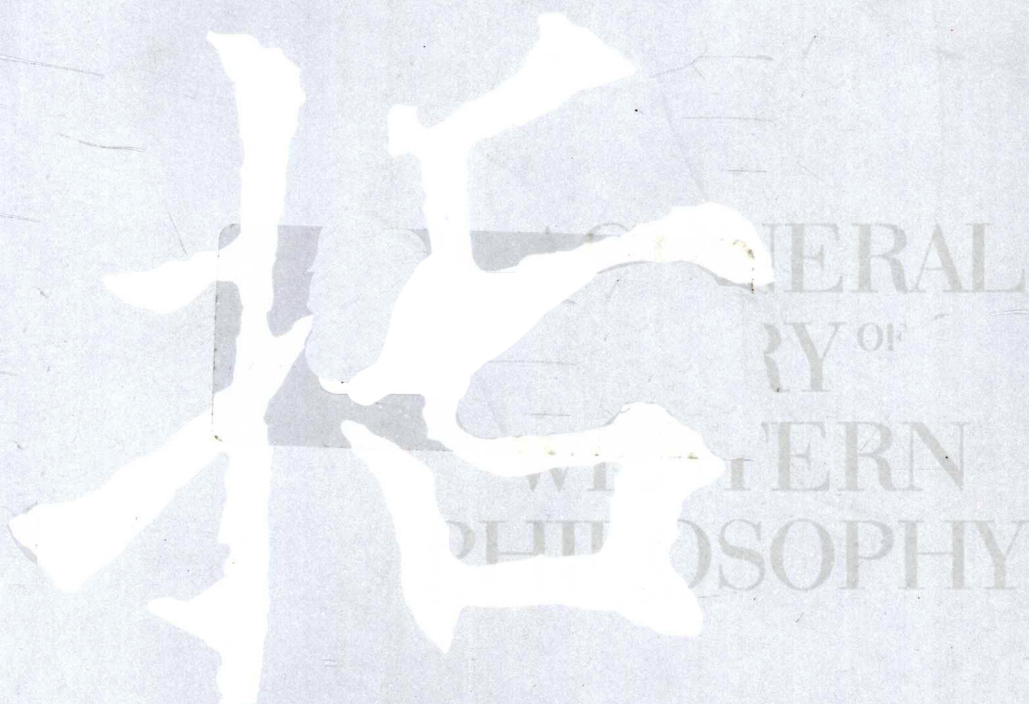
西方哲学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主编◎刘放桐 俞吾金

#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Philosophy in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余碧平◎著



 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主编◎刘放桐 俞吾金

#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Philosophy in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余碧平◎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装帧设计:闫志杰  
版式设计:程凤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余碧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  
(西方哲学通史丛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  
ISBN 978-7-01-009880-7

I. ①中… II. ①…余 III. ①哲学史-西方国家-中世纪 IV. ①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9295 号

##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ZHONGSHIJI WENYIFUXING SHIQI ZHEXUE

余碧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25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9880-7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总 序

刘放桐 俞吾金

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吸取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以此总结和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是一些前辈专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已有过的设想。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极“左”思潮禁锢的解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可以有组织、有规划进行的新阶段,许多专家纷纷要求把原来的设想纳入现实日程。1983 年在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项目规划会就曾决定,集中国内有关单位的专业力量,共同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并把通史的编写作为课题正式列入国家规划之中。然而,由于参与单位多、观点分歧大等原因,这一课题后来未能按规划执行。原来分工负责编写古希腊罗马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阶段的专家,在从事专题研究和资料编译、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性的西方哲学通史终究未能问世,毕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事实上,当我们需要查阅较为详细的西方哲学史读物时,还只能利用考普尔斯顿(F. Copleston)等西方学者撰写的通史。

“九五”初期,复旦大学把外国哲学学科确定为“211”重点建设学

科,要求学科提出大型的研究课题,我们就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复旦大学西方哲学学科成员较多、同一单位易于配合等有利条件,独立地编写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还不厚实,教学任务也比较繁重,主要成员均承担着多项研究课题,学术观点上也互有差异。但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编写过《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这样的著作,学科的中青年成员思想活跃,学术上有潜力,凝聚力也比较好,还可以借鉴国内外前辈专家和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作出最大努力,上述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克服困难也是我们更好地取得进步的有效途径。如果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能独立完成这个课题,就不光适应了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将使自己在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上更加全面和扎实。学校领导和“211”立项评审专家支持并批准了这个课题。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西方哲学通史》分为如下十卷:《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二十世纪法国哲学》、《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编写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的计划早已公之于众,得到了许多同行的鼓励。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多。其中最突出的困难是,编写组主要成员在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方面负荷太重,难以集中精力投入编写工作。有些人也怀疑我们能否进行下去。但我们一直没有动摇。尽管各卷预定的成稿时间有所延迟,但大家都十分努力,估计总体上的时间框架也不会被延误。

下面,就《西方哲学通史》编写中出现的三个全局性问题的处理做一些说明。

## 一、通史在学术品格上如何定位的问题

众所周知,通史的写作应该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教材,它不仅应该把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容贯通起来,而且应该体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应该有自己学术研究上的高度和深度。另外,通史也应该异于断代史和专题性著作的编写方式。后者对局部的对象可以做深入的探讨,甚至可以就某些细节进行反复的辨析和讨论。然而,通史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多,难以进行深入细致的推敲,倒是更应该重点阐释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编写组成员对此均无异议,但是,由于各卷的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处理的方式也难以取得完全的一致。总的来说,我们要求各卷都从“破”、“通”、“新”三个方面作出努力。所谓“破”,就是打破历年来西方哲学教科书的传统框架;所谓“通”,就是抓住主要思想脉络,把西方哲学演化的不同历史时期贯通起来;所谓“新”,就是结合当代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尽可能对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新的阐释。

## 二、通史各卷如何保持一致性的问题

起先,我们试图在对西方哲学本质特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解上确立起共识,但是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发现,确立这类实质性的共识是十分勉强的。因为编写组成员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上见仁见智,迥然各异,很难达到观点上的一致性。何况,各卷在写作中涉及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涉及的人物很多,内容也很

散,《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也涉及许多国家、许多哲学流派和许多哲学家,内容显得更为庞杂。相反,《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涉及的人物就比较少,思想发展的线索也比较清晰。因此,在实质性的观点和方法上达成一致是不现实的,甚至在阐释方式和安排上,各卷也难以达到完全的统一。本来,我们打算撰写一篇数万字的“总序”来阐明我们的哲学史观、哲学史研究方法及对一系列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理解。但考虑到上面的因素,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

现在这个简短的“总序”只是对编写《通史》的缘起以及编写中存在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我们主张并鼓励各卷在写作上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风格,但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通史的组成部分,因而要求各卷的编写者应该尽可能关注通史在整体上的一致性。除了力求做到上面提到的“破”、“通”、“新”外,在写作体例上也要求尽可能接近。比如,每卷除“总序”外,再设“分卷序”,对本卷的写作背景、主要写作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要作出相应的说明。我们还对各卷之间的“衔接问题”逐一进行研究和讨论,尽可能做到“思路不冲突,内容不重复”。有的哲学家的理论具有跨越时代和派别的意义,在相关的分卷中都应当提到,但也要注意不同的角度和详略上的差异。

### 三、通史各卷如何布局、如何厘定相互关系的问题

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长段时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分期,虽然国内外哲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划分,但对其历史发展线索的处理大多比较相近。我们所做的改动主要是对17—18世纪哲学的分期和叙述方式作出了不同的处理,即不采用“经验论、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类传统的划分方式,而是把这个时期划分为“以17世纪为主的形而上学和以18世纪为主的启蒙哲学”这两大块。至于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新

发展,过去曾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而遭到简单的否定。实际上,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个部分乃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最为丰富、也最有现实意义的组成部分。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安排了《通史》的一半篇幅即五卷的篇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新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在以往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中,人们总是简单地把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叙述体系变得残缺不全,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诠释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变得难以索解了。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西方哲学通史》的编写过程中考虑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重,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当代的新发展纳入西方哲学通史的整体架构中去。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在《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卷中,我们对马克思实现哲学的划时代革命的过程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中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危机和新的走向做了全面的论述。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是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十多位教师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我们向哲学界所做的一个学术汇报、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献上的一份精神礼物。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哲学通史》的编写依然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疏漏、处理不周甚至错误之处都在所难免,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 分卷序

### 一、研究对象与历史分期

本书专门研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哲学”。根据《新大英百科全书》的界定<sup>①</sup>，“中世纪”(Medium Aevum)一词最早为15世纪人文主义者用来描述西欧历史中介于公元5世纪罗马文明崩溃到15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的历史时期。后来，人们大都把中世纪限定为从公元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蛮族人废黜，到1453年拜占庭王朝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为止的西方历史，而把文艺复兴时期确定为从1453年到16世纪末。

那么，什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哲学”呢？严格地说，“西方”(The West)概念源于公元395年罗马皇帝提奥多塞一世把罗马帝国分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从此，西罗马帝国这一区域就成了“西方”概念的原型。当然，“西方”概念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概念，还是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有着自身的概念史。可以说，我们这里要研究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恰恰属于“西方”概念的初始形态，即拉丁基督教文化，因为维系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纽带是拉丁语和基督教。而在文艺复兴之后，由于各民族语言逐渐取代拉

<sup>①</sup> Cf.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18, 2002, p. 609.

丁语,以及宗教改革和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西方”概念进入了近现代文化形态,而西方哲学也就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表现为意大利哲学、西班牙哲学、荷兰哲学、法国哲学、英国哲学、德国哲学和美国哲学等。

具体说来,在公元476年之后,原罗马帝国境内(或更确切地说,环地中海世界)在希腊化—罗马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演化出了四种文化——拉丁西方文化、拜占庭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犹太文化——互动的局面。其中,拉丁西方文化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发展也很缓慢。从公元6世纪一直到公元1000年,拉丁西方世界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历经希腊—拉丁文化、基督教和日耳曼文化等不同传统的融合,并在击退穆斯林、让维京人和马扎人皈依基督教之后,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原希腊—罗马文明的拉丁基督教文明。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早期的中世纪”(Early Middle Ages)。而从公元1000年开始,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进入了快速扩张时期,不仅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政治、教育、宗教与军事等方面都处于上升阶段。先是发生在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拉丁罗马教会标榜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随后是从1096年开始,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又多次发起十字军东征运动,一度占领了耶路撒冷等中东地区,建立了拉丁帝国,把拉丁基督教文化扩张到东方世界。在教育上更是可圈可点,先后创办了各种学校,包括像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对近现代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教育机构。这一上升势头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史称“中世纪的高峰”(High Middle Ages),亦即“中期的中世纪”(Central Middle Ages)。但是,从14世纪初开始,拉丁西方世界就好运不再了,进入了“晚期的中世纪”(Later Middle Ages)。经过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和教会大分裂等事件的打击,不仅拉丁基督教会的权威一落千丈,而且世俗王权也受到议会等的制约,神秘主义和世俗化倾向开始抬头,为日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

一般而言,意大利文艺复兴在14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先是拉丁

古典文化的复活,随后是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然后,文艺复兴又从意大利蔓延到欧洲各地。此外,由于教会内部的分裂,出现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导致“三十年战争”,不仅让神圣罗马帝国解体,而且通过“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立了近代国际体系。从此,拉丁西方世界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近现代世界。

众所周知,中世纪西方哲学的核心主题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在界定其精神实质方面,却看法不一。吉尔松(Etienne Gilson)认为中世纪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基督教哲学(the Christian philosophy)。<sup>①</sup>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根据,因为中世纪哲学研究确实是在教会开办或主持的学校或大学中展开的,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从总体上不能违背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这一说法像“方的圆”和“金山”一样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基督教作为神学与哲学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主启示,后者重理性,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不相兼容的。对此,吉尔松本人也有所认识,他曾说:“并不存在基督教理性这种东西,但却可以存在一种基督教对理性的运用。”<sup>②</sup>显然,这种解释更接近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基督教中也有哲学思考,即对理性的运用,但是并不存在什么基督教哲学,就像不存在什么基督教数学、基督教物理学一样。<sup>③</sup>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吉尔松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也主张使用“基督教哲学”一词,认为从查士

① Cf. Etienne Gilson;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A. H. C. Down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9, p. vii.

② Ibid., p. 12.

③ 不过,在国际学术界,许多文献的作者常常不加界定地使用“Christian Philosophy”(基督教哲学)、“Christian Platonism”(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和“Christian Aristotlianism”(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等术语。为避免造成误解,我在本卷中只使用“基督教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Christianity)、“基督教中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 in Christianity)和“基督教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Aristotlianism in Christianity)。

丁开始的早期教父哲学家就把基督教界定为“启示哲学”。<sup>①</sup> 不过,他对“古代哲学”的界定与众不同,认为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早期的基督教,哲学不是一个个学说和体系,而是指为了获得智慧,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包括对世界、他人和社会的看法,也即选择哪种精神修行的方式。虽然这种对哲学的新定义很有新意,也更贴近哲学史的事实,但是,它却忽视了作为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哲学,其精神实质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与启示、信仰相对立的。

对此,吉尔松倒是有所认识。不过,他在《中世纪哲学的精神》中却做了相反的界定:“中世纪哲学的精神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贯穿了希腊的传统,并在其中发酵,引申出了一种世界观,即基督教世界观。”<sup>②</sup> 其实,中世纪哲学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与希腊哲学传统合流的结果。虽然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方世界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强力压制、扭曲和控制希腊哲学传统,让它成为神学的侍女和工具,但是,希腊哲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并未消失。即使是在蛮族入侵并分别统治原西罗马帝国各地的“黑暗时代”,像波埃修等人仍然努力传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文主义,并坚持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了9世纪卡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期,阿尔昆在帮助查理大帝建立各类学校时,就是以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为模本的,其“七艺”科目主要源于希腊的知识传统。而且,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更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从12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大胆地吸纳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拜占庭的“新知识”,用更具世俗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取代了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中的柏拉图主义。其中,理性质疑和反叛精神正是其发展的动力,而且,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哲学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此外,在奥古斯丁、波埃修、爱留根纳、安瑟伦、阿伯拉尔、大阿尔伯

① Cf. Pierre 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Gallimard, 1995, pp. 355 - 358.

② Cf. Etienne Gilson;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A. H. C. Down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9, p. viii.

特、阿奎那、罗吉·培根、邓·斯各特、奥卡姆等人的著作中,虽然弥漫着神学思想,但是,其中亦包含着完整的和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伦理与政治思想方面,毫不逊色于西方哲学史上其他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因此,我们认为吉尔松提出的“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不仅难以全面概括中世纪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也不准确。在本书中,我们把中世纪哲学界定为西方哲学的早期形态,其精神实质是来自希腊哲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它贯穿于基督教神学教义之中,即使是上帝的存在、世界的秩序、灵魂的等级、神恩与获救等超验问题,也要进行理性论证,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希腊哲学的视野和内涵,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 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学的结构变迁

从哲学史上来看,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希腊—罗马哲学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原罗马帝国境内,分别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相结合,哺育了拉丁西方哲学、拜占庭哲学、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相比较而言,拉丁西方哲学起步较晚,深受其他三种哲学的影响。因为在拉丁西方世界,由于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希腊—罗马文化有如“花果飘零”,除了少数原罗马贵族及其子弟(如波埃修等人)外,它只是在基督教教父们与修道院中保留着一点香火,而且主要是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少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文本。

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里,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中叶之前都是柏拉图主义(或奥古斯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它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基督教的创世说结合起来,认为可见的物质世界只是神圣实在的象征,它是不真实的,唯有非物质的神及其观念(或逻各斯)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13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经院学者们眼界大开,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占据上风,开启

了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原来在柏拉图主义的主导下,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智慧,即有关宇宙创生的完整知识。与柏拉图主义不同,亚里士多德主义完全承认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认识和理解它是哲学的合法任务。

到了14世纪下半叶,奥卡姆开始挑战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预示着经院哲学的没落和近代实验科学的来临。而与此同时,人文主义在经院哲学内外弥漫开来,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特别是,在15世纪初,由于在土耳其人的不断打击下,拜占庭帝国日渐式微,一些精通古希腊哲学的拜占庭学者跨海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古希腊原典出发翻译和讲授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人的思想,复兴了柏拉图主义。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有关天文学、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对哥白尼、伽利略和笛卡儿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他们不像柏拉图等人那样只注重数学本身的抽象证明,而是用数学来解释物理现象和实验,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从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近代科学革命。在本书中,我们将着力揭示这些思想转型与变化。但是,我们仍按照学术界公认的时代划分来进行。

我们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结构变迁。第一次发生在公元4—9世纪,拉丁西方哲学由此形成,其中,奥古斯丁、波埃修和伪迪奥尼索斯是主要奠基人或精神之父。可以说,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在“七艺”中强调辩证法的作用,而在神学本体论领域里坚持基督教中的柏拉图主义。第二次转折出现在13世纪中叶,由托马斯·阿奎那发展出的基督教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开始在经院哲学中取代柏拉图主义,成为主流。最后一次转型则是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由奥卡姆倡导的极端唯名论、彼特拉克和萨吕达提的人文主义、共和主义,以及菲西诺等人复活的古典柏拉图主义和古代数学传统,不仅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而且也让拉丁西方哲学逐渐走出了经院哲学的窠臼。

从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哲学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柏拉图主义（具体表现为奥古斯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主流的阶段和人文主义流行阶段。在第一阶段里，哲学家们习惯于柏拉图主义的“先天”（A Priori）思维方式，大多主张唯实论，从概念和原则出发，推理出事实来，其典型表现就是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而在第二阶段里，虽然奥古斯丁主义仍然是基督教会的教条，但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已经成为主流，亚里士多德甚至成为哲学家的代名词，像阿奎那等人在坚持柏拉图主义的“先天”思维方式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后天”（A Posteriori）思维方式，主张从经验和感觉出发，归纳出各种原则，通过“类似”推理把个别与普遍、经验和超验勾连起来，如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过，从14世纪开始，随着人文主义的流行，注重具体实验和数学演算的思维方式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抽象说教。可以说，这三种思维范式都分别具体表现在以上三个阶段的各种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伦理和政治学说中。

大致说来，中世纪西方哲学主要包括本体神学（Onto-theology）、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四个方面。它仍然继承了古希腊哲学有关自然（Phusis）和伦理（Ethos）的两分法，力图回答“万物的本原是什么”、“人如何认识它”和“人如何才能成为有德性的人”等问题。不过，中世纪西方哲学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之处就在于，它把这些世俗的问题都纳入到基督教神学框架之中，把古希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依次转化为神学本体论、光照论和成圣论。不过，在12世纪的萨尔兹伯利的约翰那里，拉丁西方哲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政府原理》中，萨尔兹伯利的约翰通过读解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恢复了斯多葛主义的自然观念，把自然区分为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而把上帝等同于能动的自然，这不仅成为了后来斯宾诺莎等人泛神论的思想来源，而且为拉丁西方人敢于去研究自然打开了方便之门。到了13世纪中叶前后，随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论天》、《论灵魂》等全部著作陆续译成拉丁文，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概念也被完整“复活”了，自

然、意识、伦理、政治和法律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和全面的探讨。如果说在阿奎那那里，哲学相对于神学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那么到了拉丁的阿威罗伊主义广泛流传的时代，哲学已经踢开神学，成为人文学者们热衷探讨的话题。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从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古代哲学到公元476年之后的中世纪拉丁西方哲学，也不存在根本的断裂。虽然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古代哲学“花果飘零”，但是并未消失，而是分别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拉丁西方人和犹太人所继承。在拉丁西方世界里，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古代哲学通过基督教中的柏拉图主义，特别是奥古斯丁、波埃修和伪迪奥尼索斯等人的哲学，成为拉丁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古代哲学与中世纪的拉丁西方哲学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断裂，而是似断若连。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中世纪的拉丁西方哲学是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中的柏拉图主义、波埃修等人发起的“希腊化文艺复兴”和伪迪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等要素的基础上的重构。

同样，虽然文艺复兴为近现代西方文化开辟了道路，而且许多著名历史著作（如14卷的《新剑桥近现代史》）还把文艺复兴纳入近现代史，但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间也不存在根本的断裂，而是一种连贯的变形，而且它们之间的过渡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比如，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概念——实体、科学、自然、知识、主权、自然法、政府、正义、财产权等，都是源于（或重新界定于）中世纪，并在文艺复兴时期破茧而出的。

### 三、研究方法

当然，以上关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学的精神及其结构变迁的分析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研究心得。不过，哲学史的研究总是依



据一定的方法进行的。在这一方面,法国著名思想史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知识型断裂论”,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在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史上,福柯的这一“断裂论”是针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结构”概念而提出的。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是与拉康、福柯、巴尔特一起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有意思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却根本不认同这种分类。197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法国,只有三位真正的结构主义者:邦维尼斯特、杜梅兹勒和我。”<sup>①</sup>

平心而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夫子自道是有道理的。他所主张的“结构”是同时性的和普世的,而拉康、福柯和巴尔特则更重视同时性的结构在历史中的断裂、重组。根据马塞尔·埃纳夫的说法<sup>②</sup>,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拉德克利夫·布朗1940年发表的《论社会结构》一文,即社会结构是全部社会关系组成的系统。二是1941年与雅各布森在纽约的交谈,让他认识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性,即结构就是各种语言成分之间不变关系构成的系统,也即同时性系统。三是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结构”概念,即一旦各个数学要素之间的关系符合某些公理条件,那么这些公理条件就构成了模型,通过各种模型就能分析出其中的数学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就是要用这类模型在各种社会事实中探寻恒定不变的同时性系统。它不仅限于一时一地的社会,或者一般的社会领域,而是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场所与事实。

用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话来说,界定结构就是“要搞清楚作为结构分析之对象的这些模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属于民族学,而属于认识论,因为这些界定根本不借助于我们研究的材料。我们认为,

<sup>①</sup> Marcel Henaff: *Claude Levi-Strauss et l'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Belfond, 1991, p. 13.

<sup>②</sup> *Ibid.*, pp. 23 - 26.